

還「問題與主義」之爭的 本來面目

• 李 林

始於1919年的「問題與主義」之爭，當事人已有所定論，胡適在晚年稱這是他「同馬克思衝突的第一個回合」^①。大陸學者曾把這場論戰看作是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鬥爭，是一場「爭奪新文化的領導權的鬥爭。」^②海外學者各執所見。代表性的觀點認為這是「自由主義與採取全盤解決態度的權威主義」之爭^③。然而，筆者認為，從當時的大量史料考察，引發這場論戰的原因和對手是諸多而非單一的。胡適作為這場論戰的始作俑者，對他來說引發這場論戰的緣由很多，可分三類：一是直言不諱大做文章的；二是文中若隱若現的；三是藏而不書有意迴避的。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既不是引發這場論戰的唯一原因，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胡適論爭中的唯一對手。

馬克思主義既不是引發這場論戰的唯一原因，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胡適論爭中的唯一對手。

胡適直言不諱的論戰原因

一 針對當時各種主義盛行的狀況 早在1918年3月胡適寫了《旅京雜記》^④，請注意這是在李大釗於同年7月、11月、12月撰寫〈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的文章之前。文中說道：

如今的人，往往拿西洋的學說，來做自己議論的護身符。例如你引霍布爾來駁我，我便拿盧騷來駁你；甲引哈蒲浩來辯護自由主義，乙便引海智爾來辯護君權政權，丙又引柏拉圖來辯護賢人政治。……不去研究中國今日的現狀應該用甚麼救濟的方法，卻去引那些西洋學者的陳言來辯護自己的偏見。

胡適撰寫這篇文章時，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未曾出現，談論「社會主義」的主要還是無政府主義者、國民黨人、進步黨人和社會黨人。〈多研究問題，

少談些「主義」的主旨在《旅京雜記》中早有體現。所謂「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甚麼用處的」，恰是指當時知識界存在的普遍現象。當然此種現象也存在於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身上。李大釗在與胡適的論戰中毫不掩飾地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於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後誓向實際的方面去作。這是讀先生那篇論文後發生的覺悟。」^⑤

如果說李大釗的話是真摯而並非客套的，那麼應該說胡適所批評的現象是存在的。那麼，胡適對中國思想界的這種認識是否一貫呢？1930年胡適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講演〈從新文藝觀察今日中國的思潮〉，指出：「近世的思想，從左至右，都是皮毛的，看不出真正的思想。」「近世中國思想的最大的毛病：（一）用籠統抽象的名詞來包括一切，打倒一切。（二）盲從，無論甚麼即容易相信，不去細想。（三）成見太深。」^⑥反觀1919年胡適的批評，應該說這是對中國知識界、思想界「從左至右」的泛論。當然馬克思主義也在所指之列。

李大釗在與胡適的論戰中毫不掩飾地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於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後誓向實際的方面去作。這是讀先生那篇論文後發生的覺悟。

二 胡適明文攻擊的北洋安福系 有學者認為胡適對王揖唐和安福系的攻擊不過是想借其惡名來「玷污社會主義」^⑦。我認為胡對安福系的攻擊，不僅僅是論戰的手段，主要是論戰的目的。

王揖唐和北洋安福系搞所謂「民生主義研究會」，大講「社會主義」，不單單是個附庸風雅，嘩眾取寵的問題，而是同當時南北議和的政治需要相關的。筆者在孫中山1919年8月17日寫給林修梅的信中發現了這段史實，孫中山信中寫道「段所派者，則為安福部人。文要求以能完全贊同文學說之主張，乃有相商之餘地。迨《學說》出版後，王揖唐、徐樹錚、曾毓雋等俱經看過，皆極端贊成，復詳加批注，交段閱看，段亦大體贊成，然後再派人來相商。余乃示以根



胡適指責那些誇口「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是自欺欺人的夢話，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是中國社會改革的死刑宣告。

本辦法及維持現狀辦法兩種。……然文必須段能完全服從我之主張，乃能引以為同志也。蓋吾人救國，為有主義有辦法之救國，必能服從主義，推誠共事，始可共築進行。」^⑧從孫的信中可以看出王揖唐對孫的學說表面上是贊同的，所謂「民生主義研究會」也不是空穴來風，而是一種政治鬥爭的需要。而且王揖唐所談的「社會主義」沒有超出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範疇，而是將這兩個名詞混用，如北洋喉舌《公言報》就把「民生主義研究會」稱之為「社會主義研究之組織」，這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後者恰是他們禁止和反對的，這的確是北洋時期一個極其怪異的現象。李大釗曾作時評：「近來有很多印刷物被政府用『鼓吹共產主義』的罪名禁止了。可是政府舉行的文官考試，卻出了『共產主義』的題目，給考試文官的人以大鼓吹而特鼓吹的權……有人說那是官家的共產主義、孔子的共產主義，毫不帶危險的性質，與你們小百姓們所研究的不同。我想這話也不錯。」^⑨所以胡適才有「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的議論^⑩。既然論戰當事人都知道這種區別，也就不存在借王揖唐和安福系的惡名去玷污「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問題。

其實，胡適攻擊安福系的真正原因和目的是可察的。他與北洋政府的安福部頗有宿怨。胡適的自傳曾寫道「這年春天(1919年)，北京鬧起了『新舊思潮之爭』，校外的反對派意想利用安福部的武人政客來壓制這種新運動。」^⑪當時安福政權的護法大師是段祺瑞，而段祺瑞的腦筋是徐樹錚。徐樹錚是林紓的門生，頗自居於「衛道君子」。當時風傳胡適、陳獨秀等被驅除北大，甚至被捕的謠言，也足見胡適與安福系的緊張關係。胡適所說的「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⑫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所罵所指並非是主義，主義是「好聽的」，而是指那些利用口號的「無恥政客」和「阿貓阿狗」。過去大陸一些學者認為這是對馬克思主義者的惡毒攻擊。我以為胡所攻擊的主要是安福系的政客，是實指而非虛罵。因為胡適在論戰中曾反覆解釋和說明：「現在世界各國，有一班『把耳朵當眼睛』的妄人，耳朵是聽見『布爾札維主義』的名詞，或是只是記得一個『過激主義』的名詞，全不懂得這一個抽象名詞所代表的是甚麼具體的主張，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過激黨』，便硬把『過激黨』三個字套在某人某人的頭上。這種妄人，腦筋裏的主張，便是我所攻擊的『抽象名詞』的主義。我所說的『主義的危險』便是指這種危險。」^⑬8月30日北洋政府查封了由胡適接辦的《每周評論》，與胡適的政治態度是分不開的。

胡適攻擊安福系的真正原因和目的是可察的。他與北洋政府的安福部頗有宿怨。當時風傳胡適、陳獨秀等被驅除北大，甚至被捕的謠言，也足見胡適與安福系的緊張關係。

並不明顯的的爭論

胡適在爭論其後的幾年逐漸明朗化。除了馬克思主義，胡適還對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進行了批評。

一 關於無政府主義 胡適指出「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

胡適在爭論其後的幾年逐漸明朗化。除了馬克思主義，胡適還對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進行了批評。

社《自由錄》，看一兩本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了。」¹²

胡適的這番議論事出有因，是有針對性的，是對着黃凌霜和他的實社的。

黃凌霜作為北大外文系的學生，在五四運動前後主張無政府主義。1917年組織實社，編輯《自由錄》。1919年1月創辦《進化》月刊。2月在《進化》月刊第二期發表文章，攻擊《新潮》雜誌第一期第一號羅家倫撰寫的《今日世界之新潮》，聲稱「我們要曉得社會革命和科學革命不同，社會革命是將全社會的惡制度從根本上推翻，拿新的來替代了他；若是畏首畏尾，這簡直是基督教的改良主義，還能算作社會革命麼？」¹³黃的舉動胡是不能漠視的。胡適在北大外文系授課，又是《新潮》雜誌和新潮社的幕後顧問，羅家倫、傅斯年為胡適得意弟子，有許多觀點直接源於胡適。而無政府主義提出的「從根本上推翻」，正是胡適所堅決反對的。

二 關於基爾特社會主義 無庸置疑的是，代表自由主義傾向的受杜威實用主義影響的胡適與傾向基爾特社會主義受羅素、柏格森影響的進步黨研究系成員（如梁啟超、張東蓀、張君勱、藍公武）是有思想距離的，胡適所說的「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談基爾特社會主義」，目標很明確。（當然胡適與他們的分歧不止這些，遂才有了其後的科玄論戰。）

1919年9月正值「問題與主義」論戰興起之中，由北平新學會創辦的《解放與改造》雜誌問世了。該會由梁啟超、張君勱、張東蓀等發起，在該雜誌發表的〈新學會宣言〉中提出從學術思想上謀「根本的改造」。「根本解決」、「解放與改造」是當時的熱門話題，也成了胡適批評的靶子。

胡適的幾篇論戰文章指責「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¹⁴「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籠統解放，改造也不是籠統改造。解放是這個那個制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那個人人的解放，是一點一滴的解放。改造是這個那個制度的改造，這種那種思想的改造，這個那個人人的改造，是一點一滴的改造。」¹⁵胡適提出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觀點後，藍公武等便出來與胡適商榷。總體說來，胡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爭論並不明顯，卻不可視之於無。

孫中山把很大精力放在了對國家建設的學畫上，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方案。這在胡適眼裏，實在比鼓吹革命高喊主義要有意義得多。

胡適有意迴避的論戰原因

這類原因，筆者認為有兩點可供討論。

一 與孫中山的關係 從胡適的文章和奇譎矛盾的筆法上看，我認為他對孫中山和國民黨人的某些言行是頗有微辭的。但由於當時的歷史環境以及他同國民黨人的關係，胡採取了亦褒亦貶的迂迴方式。

《每周評論》第31期除了刊登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

還發表了他的另一篇文章，對孫中山的《建國方略》予以讚賞。孫中山把很大精力放在了對國家建設的擘畫上，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方案。這在胡適眼裏，實在比鼓吹革命高喊主義要有意義得多，所以胡適對孫中山的《建國方略》持某種欣賞的態度。

但是，當時嚴酷的政治形勢不可能僅要求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只談具體的建設計劃而迴避政治問題。孫中山指出當時的救國辦法有二，一是「維持現狀」，二是「根本解決」。所謂「維持現狀」的法子就是南北議和，趕快把這個國會恢復起來，令他自由行使職權。」而根本解決的辦法是「南北新舊國會一概不要他，同時把那些腐敗官僚跋扈武人、作惡政客完完全全掃乾淨他。」^⑬當然，按照胡適的理論他自然希望選擇前者而非後者，而「根本解決」的思想正是胡適在這場論戰中一再反對的。

所以當孫中山力主的革命黨人雜誌《星期評論》創刊時，創刊詞明白無誤地寫道「凡是一種報紙問世，必定有一種標明主義和趨向的話」^⑭。胡適見後流露過不滿說「《星期評論》的第一期出世時，我們看了雖然喜歡，但覺得這不過是《每周評論》第二罷了。」^⑮當《星期評論》第二期登載建設方針時，胡適則大為讚賞道：「現在《星期評論》的建設方針，情願犧牲一些『烏托邦的理論』，只求『腳踏實地的行的通』。這是極好的方法」；「偶然有一兩項『理想的』主張，也都加上『到了可能的時候』等等限制語，既沒有民國初年那種空泛的口頭禪，也很少近人的『烏托邦的理論』。」這種今是昨非亦抑亦揚的筆法，反映了胡適對革命黨人的希望和勸誡。問題在於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不可能完全按照胡適的設計行事。當時包括孫中山在內的革命黨人都把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等同起來，在宣傳民生主義的同時也介紹了一些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常識，論戰發生後，像朱執信、廖仲愷、胡漢民、戴季陶都同胡適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和認識有所分歧。如胡漢民批駁了社會上對唯物史觀的非難，戴季陶反對胡適對階級鬥爭學說的指責。可以說當時國民黨的主將都直接間接地同胡適展開了論戰。

孫中山畢竟不同於一般的革命黨人。一方面孫在人們心目中有較高的威望，另一方面孫對胡適這樣的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極為尊重。而胡適既要委婉地表述自己的意見，又不願造成他與孫有所分歧的印象，於是孫、胡二人便只好顧左右而言他了。《每周評論》第31期孫中山是看到了，並請廖仲愷轉達他對胡適的感謝。對胡適的閃爍其辭，孫中山應是有所洞見的，雖始終未予正面交鋒，但在論戰期間，孫中山分別在9月1日寫給于右任的信中、9月19日寫給唐繼堯的信中、9月21日覆黃玉田的信中、9月18日在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的演講中、11月11日致田應詔的信中，對宣傳主義的重要性和根本解決的觀點進行了反覆的說明和辯護。

二 胡適自己 胡適論戰的最後一個潛在原因和對手，應該說就是胡適自己。這個觀點受益於余英時先生。余英時指出，「他如果想在中國取得思想界的領導權，首先便得在國故學上有出色的表現。」^⑯胡適為了對付國故派的攻擊，必須把自己標榜為治學有術並非空談的學者，因此一方面提出反對空談主義，一方面要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當時包括孫中山在內的革命黨人都把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等同起來，在宣傳民生主義的同時也介紹了一些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常識，可以說當時國民黨的主將都直接間接地同胡適展開了論戰。

結語

引發胡適進行「問題與主義」的討論的原因是多元的。我理解這是胡適對當時中國社會、政治、思想文化的一次總體評論，也是胡適以實驗主義、自由主義為尺度，對當時中國社會其他非實驗主義、非自由主義的一次評判。

鑒於上述史實，我們如何看待當事人自己對這場論戰的評價呢？胡適愈到後期愈強調這場論戰的政治意義和反馬克思主義色彩。筆者認為，自論戰之後的幾十年，社會主義思潮逐漸成為中國思想界發展的主流，而胡適論戰中所涉及的其他主義、思想、問題，隨着歷史的發展和時間的推移已成陳迹，論戰中涉及的一些人物，如王揖唐、黃凌霜等也相繼退出歷史舞台。對胡適來講，這場論戰最為風光，最值得記憶的當算是反社會主義傾向，胡儼然成為二十世紀反社會主義潮流的中流砥柱。而其他因素則可忽略不記，這當然和胡適後來的政治選擇有直接的關係。

胡適多次講，要還歷史一個本來面目，這話對於我們研究胡適已有定論的那場論戰同樣適用。

1990年10月初稿

1991年10月三稿於青年公寓

對胡適來講，這場論戰最為風光，最值得記憶的當算是反社會主義傾向，胡儼然成為二十世紀反社會主義潮流的中流砥柱。而其他因素則可忽略不記，這當然和胡適後來的政治選擇有直接的關係。

註釋

- ① 參見唐德剛譯著：《胡適的自傳》（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
- ② 耿雲志：《胡適研究論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頁28。
- ③ 史華慈：〈五四運動五十年講論導言〉，轉自：《五四與中國》（台灣聯經出版社）頁280。
- ④ 《新青年》卷4，3號，頁252—4。
- ⑤ 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35期，1919年8月17日。
- ⑥ 《上海青年》，卷30，11期。
- ⑦ 鄧野：〈王揖唐的「社會主義演說」和「問題與主義」論戰的緣由〉，《近代史研究》，1985年6期。
- ⑧ 《孫中山全集》卷5（中華書局，1985），頁107。
- ⑨ 《李大釗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9），頁124。
- ⑩ 胡適：〈紀念五四〉，《獨立評論》，1935，149期。
- ⑪ 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36期。
- ⑫⑬ 《每周評論》31期，1919年7月20日。
- ⑭ 凌霜：〈評《新潮》雜誌所謂今日世界之新潮〉，《進化》卷2，2期，1919年2月20日。
- ⑮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卷7，1號。
- ⑯ 《孫中山年譜》（中華書局，1980），頁249。
- ⑰ 《星期評論》1期，1919年6月8日。
- ⑱ 《每周評論》28期。
- ⑲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上的胡適》（台灣聯經出版社，1984），頁41。

李 林 1960年生，1983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同年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文化思想史、現代化理論和史學理論方面的研究。曾發表〈新文化運動與非理性主義思潮〉、〈關於李大釗早期思想的若干思考〉、〈論史學主體的一致性〉等30多篇論文，編著《新權威主義》等書，現為《近代史研究》雜誌編輯，中國現代文化學會理事。